

版画大家赵延年

岳洪治

赵延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版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我国家版界钻研鲁迅作品最为深刻，实践鲁迅木刻教育最为勤奋，获得艺术成就最为辉煌的大师级艺术家。”（李允经）许多读过《阿Q正传》的人，觉得阿Q就是赵延年版画中的那个样子。赵延年的代表作《鲁迅像》，以白色长衫、黑色围巾与黑色背景，反衬出鲁迅的冷峻与深邃。画面中那疏密有致的刀痕，那长短粗细错杂呈现的线条，令所有面对《鲁迅像》的观者，都能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氛围，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和赵老的相识，也是缘于鲁迅。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我最喜欢的作家作品，是鲁迅和他的书。如果能够经手出版几种图文并茂的鲁迅作品，是我作为一个图书编辑的荣耀。这个愿望，在2001年6月“《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召开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实现的机会。会议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同来参会的鲁迅博物馆的李允经老师。李老师既是鲁研专家，又是版画史家，让我深入了解了赵老在当代木刻版画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在鲁迅题材版画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会后，经由李老师介绍，我与赵老取得了联系，并达成了出版《赵延年木刻插图本鲁迅作品集》的意向。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个项目非常支持。从2002年初到2003年底，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我们陆续推出了《赵延年木刻插图本〈阿Q正传〉》《赵延年木刻插图本〈狂人日记〉》《赵延年木刻插图本〈野草〉》《赵延年木刻插图本〈故事新编〉》等几种鲁迅作品的插图本，总印数高达20余万册。其中，还有几种插图本的版权，卖

到了中国香港和韩国等地区和国家。

“木刻插图本鲁迅作品集”在图书市场的优异表现，是赵老辛勤劳作的成果，与他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对编辑出版工作严格要求分不开。赵老由始至终参与了这套书编辑出版的全过程。他对每本书稿的清样，都看得仔细、认真，对书稿编辑印制质量，都有严格的要求。看到编印工作上的进步，他会由衷地高兴，给予肯定和鼓励；看到缺点与疏漏，也及时指出，以保证书稿质量。譬如，在收到《插图本〈阿Q正传〉》书稿清样后，他于2002年3月9日来信说：“总的来说版子制得还不错。其中有些白点，我用红笔涂了，标明须填黑。有几处因制版后缩小，且有些细部已模糊，故索性去掉。以上两点，请务必印刷厂注意调整。”6月11日又来信告诉我：“已开始构思《故事新编》的插图稿”。又说“四版《阿Q正传》”的封面，比过去响亮，但其中有些作品的细线仍不清晰，非常影响效果”。7月27日信中，又非常细致地嘱咐我：“《狂人日记》第二图下边的黑框不能去掉。”“《风波》中的主角，右脸线条有点模糊，对形象有损。”“《阿Q正传》39图、40图，版子制得不清晰，最好重做。”

在最初策划这套书的时候，我只想到采用赵老的木刻插图，出版几种图文并茂、老少咸宜的鲁迅作品集。而在编辑出版了以上几种图书，更多地了解了赵老技艺精湛的木刻艺术之后，我进一步认识到，这套书对于木刻人才的培养和木刻艺术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很高的学习、借鉴的价值。因而，在2004年春节时，我便写信给赵老，讲述了我的认识和想法，同他商量，能不能请他结合这几种

鲁迅作品集插图创作的经验和心得，撰写一本谈木刻创作艺术的“大家小书”。赵老年事已高，而且两年来一直在连续工作，但是，他老人家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因此才有了《赵延年木刻鲁迅作品集图说》。这是一部关于赵延年木刻创作艺术的专著，不仅收入了丰富的插图，同时也采用了部分草图，使这本“大家小书”又像一本“木刻艺术教程”。

自2001年10月至2010年元月，因为各种出版事宜，我与赵老通过多次电话，写过不少的信。近日重读赵老信函，一位忠实践行鲁迅教育，“放刀直干”的木刻家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

2014年10月23日，一代版画大家赵延年先生去世，转眼已近十年。今年4月11日，是他的百年诞辰。谨以此篇小文，表示我对赵老的深沉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许多读过《阿Q正传》的人都觉得阿Q就是赵延年版画中的那个样子

兰亭修禊

顾农

此序的正式文本。传云：“羲之雅好服食养生，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途，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脩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兰亭盛会上，王羲之写了两首诗，四言、五言各一首，其四言的一首写道：

代谢繁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雩，异世同流。
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这里表达的意思和《兰亭集序》完全一致。既然人世永不停留地“代谢”，那么在暮春的大好时光里到风景区“散怀”享受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兰亭集序》里所说的“游目骋怀”，“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也是指此而言。王羲之强调地指出自己这种人生态度是孔夫子赞成过的——《论语》侍坐章中的曾点说他的理想是在暮春时“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曾予以肯定——所以说自己与孔门师弟“异世同流”。他在五言诗里说：

有心未能悟，适足罹利害。
未若任所适，逍遥良辰会。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忘却或淡化实际的功利的考虑，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王羲之提倡这样一种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

《兰亭集序》未曾进入萧统《文选》，曾经引起许多争议，有人据此认为此序为伪作。这是没有道理的，《文选》是一选本，未入选的文章很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郭沫若先生发表专题论文《王羲之〈兰亭序〉为真》，而《兰亭集序》是后人假托的，具体地说，《兰亭集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到1972年郭老又申论其说。郭说虽有二适先生等人提出相当有力的驳议，但拥护的人比较多，一时几乎成了定论。当年双方争论的文章皆收入《兰亭论辨》一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字迹的真伪与文章的真伪。按今日所见之《兰亭集序》墨迹，包括最为著名的神龙本，皆出于唐人的摹拟，被认为最近于原作的定武石刻本亦出于唐人所摹，都难免会带有一点唐风，但又都有其可信的依据，与一般意义上的贗品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兰亭集序》的文章，几种文本都不能算伪，因为这里有初稿本、修改本，再改本及其不同的删节本之别，字句自然不尽相同，这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笔者不敏，昔尝论之（详见顾农：《兰亭集序》真伪问题的再思考，载《中国遗产》2008年第1期），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吕思勉的读书法

王培军

读书如果是为了学问，那就不是一件易事。因为有大学问的人，总是不多，所谓“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而如果读书是容易的，那就人人都有学问，学问也就不值钱了。所以有些用功的学者，读起书来，字梳句篦，一字不放过，简直就像像年不永的李贺骑着蹇驴做诗一般，“呕出心肝”才罢。这当然有其值得称许之处，但可想而知，这样的苦读法，也一定免不了李贺所骑的那匹蹇驴的毛病，压根走不快，甚至有时在原地打转，毫无进展。其实又何必如此？最近得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装帧影印的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手稿本《中国史籍读法》，随手一翻，看到其中有一段说：

凡读书，决无能一字一句，无不懂得的。不但初学如此，即老师宿儒，亦系如此。吾乡有一句俗话说：“若要盘数，性命交托。”若读书必要一字一句都能解，然后读下去，则终身将无读完一部书之日，更不必说第二部了。（42页）

这正可以作学者的对症之药。也许有人要反驳说，《朱子语类》（中华书局本，第一册164页）中不是主张：“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方得。”“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须闲看过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你看，博学无比的朱子，不也是叫学者“下死工夫”“推勘到底”的吗？“一字不放过”，又有什么不好呢？

拉朱子以驳吕先生，似乎未为不可，但其实这却是“死于句下”了。你决料不到同是朱子，又同是在《朱子语类》中，相反地说：“学者理会文字，只是要理会会难底，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晓。《学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所谓‘攻坚，则坚者瑕；攻坚，则瑕者坚’，不知道理好处又却多在平易处。”（同前，第一册183页）他并不是要你读书一味地“攻坚”，而也是要你舍难就易，“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他所引的“攻坚、攻瑕”云云，是古兵法格言。《管子·制分》云：“凡用兵者，攻

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取其瑕者。”（《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62页）据伪房玄龄注，“攻坚则韧”的“韧”，是牢固之义，也就是说，你专去攻坚固的地方，结果必是难于攻入，“瑕”则是薄弱之处，攻瑕就较易于得手。打仗是这样的，读书为学问，有时也是这样，所以也要先攻其易，而姑且放过难的。易的已得理解，由易至难，难的也就不难解决了。朱子的意见，与吕先生的主张，原来是一致的。

有一个著名的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论，差不多可以视为这个兵法思想的实例。这个争论，关系到当时秦国的战略方针，张仪主张伐韩，司马错不以为然，主张该伐蜀，因为伐韩较难，而伐蜀则较易。《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犷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中华书局本，第七册2281—2283页）

后来历史证明司马错是对的。其中的道理，其实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知悉的“博弈论”，亦即力量的对比，因为伐蜀所获之利，而得到了改变，本来的形势，也就因此而起变化。一读《战国策》，就知那时的策士，对于这件事，已是烂熟于胸了；就连生于战国末年的不肯用心读兵法的项羽，也是心知肚明的。当章邯围困赵人于钜鹿城，楚派宋义、项羽去救，宋义行至安阳，屯兵不进；《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于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今秦攻赵，战则两败俱伤，我承其弊，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敌之承！”（第一册304—305页）

项羽所说的“赵举而秦强，何敌之承”，可谓是一语破的。彼消则此长，此弱则彼强，一切的力量对比，及因之而呈现的形势，皆在变动之中，皆彼此互为因果。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俱有因”（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636、1771页）、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同时因果”（《物理学》II.3）。行兵打仗如此，读书为学亦是如此。读书因所读之书而得的力，又反作用于书，而使其易于读解，所以书读得越多，书中的困难也就越少。博览群书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而且，有时就是被学者们接力赛似的注了几千年的最常见的书，也不是字字都能解的。近代读古书最为精湛的学者之一的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云：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陋，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中华书局《观堂集林》，第一册75页）

《诗经》有十之一二不能解，《尚书》则有一半不能解，中国二千年中读此二书的学者，又何止千万？若必“一字一句都能解”，则自汉以来，无人可称学者，也无人能博览群书了。

有一年，复旦大学召开钱锺书先生诞辰纪念会，我也去参加了。在会上，我听见一位年轻轻时与钱先生很熟的学者，说他那时请教钱先生怎么读书，钱先生回答他说：“不必看注，能懂多少是多少，往下看就是了。”这与吕先生的印证，是毫无二致的。这也就是一个绝佳的印证。必须说明，钱先生并不是全不看注的；《谈艺录》中自述为学，有一段云：

余十六岁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鲜解会，而亦作嬉笑；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及入大学，专习西

方语文。尚多暇日，许数宿好。安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若素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中华书局本，346页）

不但钱先生，就是吕先生，也另有一番说法：

治经的门径如何？第（一）先须细读经的本文。凡书经熟读，则易于了解，而治之不觉费力；且随处可以触发。从前读旧书的人，小时都熟诵经文，所以长大了要治经较易。现在的学子，这一层功夫，都没有了。再要补做，既势不可能，而亦事不可必。因为一熟诵，本来亦属浪费也。但古经、子究较后世之书为难解，读时用力稍多，则势不能免。所以对于古史有兴味的，最好能于群经中先择一种浅近的注解，阅读一过。觉得其有用而难解之处，则多读若干遍，至读来有些习熟，不觉费力为止。（50—51页）

所以，若以为吕先生教人读书，只是叫人囫圇吞枣、鲁莽灭裂地去读，那又是误会了。他只是叫人不要停留在一本书的某个地方，塞吃不进，也不要停留在一本书上，只成为一本书的学者，读书要须如江河流注，沛然而至大海，纵有时挟泥沙而俱下，也自不妨。

这本吕先生的手稿本，是前不久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华教授之邀，去参加了吕思勉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会，而得到的，在我也是非常值得爱读的。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其实就在《吕著史学与史籍》那本中读过此书，这次重翻手稿本，立刻有一种如见故人的亲切感！我对于吕先生的学问，自然是极景仰的，在中国近代的大史学家中，我最服膺的也是吕先生。晚清的大诗人陈散原，有一联诗说：“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散原觉得晚生了一千年，没有机会认识东坡、山谷那一辈人，追陪杖屦，与之往还，是一个绝大的遗憾。散原的这种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也有时候，也有如此类的胡思乱想：我想我如果在民国时代，而又有一个追随彼时大学者做学生的机会，那么，我最乐意的也就是拜吕先生为师了。

我对于钱锺书先生当然也是极佩服和喜欢的，但我觉得钱先生的天才的锋芒太逼人，做他的学生，一定不大好受；陈寅恪先生呢，学问自无可议，但他不免太悲凉了，他的精神，仿佛秋季的连绵阴雨，予人一种抑郁之感，使人不快乐；陈垣先生则身上透着一股霸气，使人怕他，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敢去接近的。其他的民国大学者，有的近于道学，有的过于名士气，有的太丘道广，有的又门庭太峻，在我看来，都不及吕先生的“其言之旨，如布帛菽粟”。

「文汇报」
微信公众账号